

独树一帜的“三秦”史料

武漢文史資料

一九九一年第三輯

● 辛亥革命在武漢

皮明麻 蕭志華

● 革命生涯片斷回憶

李守完

● 中國的「保爾」——吳運鋒

商若冰

● 鄂東抗戰中的兩大戰役

王長勳

● 南京解放前夕蔣介石二三事

徐世江

● 王占元點滴

袁家宗

● 漢陽兵工廠火藥廠聞見錄

楊日昇

● 独具特色的武漢甜食館

袁復心

武漢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

紛呈百態的近代武漢

武汉文史资料

刘作忠藏书

一九九一年第三辑

(总第45辑)



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九月

主 编：萧志华
副主编：刘通鸾
编 辑：朱务本



武汉文史资料 (季刊)

1991年9月出版

出版：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发行：武汉文史资料发行服务部

编辑：《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地址：汉口沿江大道102号

印刷：国营湖北省新生印刷厂

电话：322007

字数：150千字

邮码：430014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广字01—6号

公开发行

定价：2.20元

一九九一年第三辑 (总第45辑)

党史纵横	辛亥风云	
<p>革命生涯片断回忆 中国的“保尔”——吴运铎 从工运领导者到省委书记的夏文法 共产党员刘季良 追忆陈兰、陈耀、陈克勤三烈士</p>	<p>辛亥首义伤军解放前的坎坷经历 先父韩世昌事略 忆曾祖父蔡良村 黄恺元先生哀荣录 席正铭与辛亥武昌首义 深切怀念黄申芑伯父</p>	<p>辛亥革命在武汉 胡宪章的一生 缅怀辛亥首义元勋刘公 武昌首义金质勋章获得者李福生 记先父曹珩</p>
<p>李守宪 高若冰 许恺景 言午 陈清波</p>	<p>韩安利 韩安州 蔡华初 马安义 田景平 杨靖</p>	<p>皮明麻 胡昌华 刘发慧 戴大定 曹璧</p>
<p>109 107 104 86 59</p>	<p>56 53 47 44 41 36</p>	<p>31 27 20 16 1</p>

2B08/11

三镇百业	往事钩沉	抗 战 实 纪
<p>曹月海与曹正兴菜刀店</p> <p>独具特色的武汉甜食馆</p> <p>武汉教科书发行的演变</p> <p>抗战前后的上海生活书店汉口分店</p> <p>旧时代武汉市场货币情况拾零</p> <p>汉阳兵工厂火药厂见闻录</p>	<p>王占元点滴</p> <p>湖北省教工反饥饿斗争见闻</p> <p>我经历的汉口市社会救济委员会</p> <p>阳逻培心善堂兴废记</p>	<p>鄂东抗战中的两大战役</p> <p>我在「抗敌演剧四队」的前前后后</p> <p>抗战时期的武汉基督教</p> <p>回顾汉口日本战犯拘留所</p>
<p>胡 旭</p> <p>彭光明 袁复心 舒兴文 舍 子 田梅村 杨日昇</p>	<p>陶幼安 刘惠文 丁寿石 袁家宾 汪正本 徐世江</p>	<p>王 煜 陈 忠 傅洁霞 王长勋</p>
<p>182 177 170 166 162 154</p>	<p>150 148 144 141 138 134</p>	<p>132 125 122 116</p>

革命年代

辛亥革命在武汉

皮明麻 萧志华

90年前的辛亥革命，是一场震古烁今的革命运动。在近百年来为振兴中华而进行的革命斗争中，辛亥革命无疑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意义最完全，也最深远的一次革命运动。它带来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腾飞。在这次一举倾覆清王朝的革命巨澜中，武昌首义是触发革命高潮的浪峰，武汉地区则是革命前期的主战场。辛亥革命首发于武汉，高涨亦在武汉，而且不可讳言的是，失败也很快发生在武汉。这场革命已过去了80年，时间风雨的冲刷越加显示出当初革命运动的历史价值，也磨露出它的教训和不足。在纪念辛亥革命80周年之际，当我们深情地在武昌起义门，在球场路辛亥革命烈士墓，在阅马场湖北军政府旧址凭吊先烈和先贤时，这场早已逝去的运动，仍然以巨大的魅力唤起人们对它的再认识和深层的理性反思。

(一)

武昌为什么成为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首义之区，成为最早爆发革命的主战场，一直是学者们究心探索的。“亡清必楚”的确成为客观的历史。学者们在以往的探索中，常常从同盟会多次在南方和西南边境发动起义失败，常常从中部同盟会转而得长江革命的战略等诸多方面，来论证武昌起义的历史动因。这些无疑

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还应该从武汉自身来剖视这场革命的“内力”。这方面的工作我们也做过。不过，缺乏系统化、深层化。武汉构成为革命爆发地和主战场的历史必然性，植根于晚清时武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土壤中，植根在这一土壤中形成的革命力量、革命动机和革命觉醒上，具有多重背景。

从经济的背景看，武汉地区商品经济的兴盛和活跃，成为革命力量、革命运动生发的温床。武汉是晚清时期近代商业崛起的城市，商品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从而为革命因素的生长铺垫了广阔的经济土壤。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在武汉三镇的扩大，武汉在国内的地位呈上升趋势。1861年汉口开埠后，帝国主义在武汉兴办工厂、洋行，使武汉进出口贸易迅速膨胀；紧接着，武汉又成为洋务运动在内地的最大中心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也有相当规模，在辛亥革命前，武汉先后创建的工厂达120多家。汉口的商贸和工业在晚清时超过广州、天津，仅次于上海。

武汉为“九省通衢”。明末清初，汉口即为有名“船码头”，但均系土码头，只能停靠本船。晚清时，“九省通衢”由于开埠和轮船航运兴起，芦汉铁路竣工，被赋以现代形象。自从1872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开辟汉申线和1875年英国太古轮船公司首航汉口港后，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昔日全仗本帆船的长江水运为之一变。外国和本国十多家轮船公司在武汉营运，上至宜昌，下至上海，南至长沙、常德，北至汉水沿河的仙桃等镇。武汉可谓是一个四通之港。这就大大扩展了武汉的水路客运和货运，加强了武汉作为商品集散地和转口港的地位。1907年，大阪轮船公司开始直接在汉口与神户、大阪之间通航。次年，日本邮船公司在汉口与神户间直接通航，后来又延长至横滨。武汉不仅以转口港，而且以直接输入港显示出优势。

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使武汉从陆路贯通北方，不仅

运输速度大大加快，运输数量亦空前增加，包括河南北部都纳入以武汉为中心的商业圈。“京汉铁路使汉口与河南密接，从来天津商圈之内奄有河南北部者，铁道完成后忽南人于汉口之商圈，且与北京之交通亦趋便利。”以汉口进出口总额而言，1901年始终徘徊在四五千万两，1902年突破1亿两大关，此后持续增长。1906年为109,660,247两，1907年为127,829,261两，1908年为133,148,921两，1909年为137,789,874两，1910年为152,199,000两。水野幸吉在《汉口》一书中说：汉口贸易年额1亿3千万两，夙超天津、广东，今宜位于中国要港之第二，将进而摩上海之垒，使外来人艳称东方芝加哥不置。

同时，自1898年开始，经3年之功，武昌方面修建了武丰堤、武金堤和沿江防水墙，使市区减轻了水患。1902年，我国将武昌自开为商埠。特别是1905年汉口市郊修建了35华里的后湖长堤（张公堤），使后湖广大低地，从渍水状态中解脱，大大拓展了汉口市区的范围，汉口狭窄的街市区成倍扩大，为汉口形成为近代都市提供了必要的地理条件。

由此可知，由于水陆交通的近代化和地理条件变化等因素，武汉在当时一跃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商业都会。武汉这一都市地位，使其具备造就一大批有近代民主意识和革命觉醒的知识分子群、新军士兵群的条件，也具备吸收、聚结、隐藏各种革命组织、革命分子的条件。

从政治背景上看，在这一时期，武汉政治地位也得到加强。武昌向为湖广总督驻地，湖北省省垣，华中重镇；汉口的经济地位日见提高，其对湖北、华中乃至全国的政治影响也日益扩大。此时的武汉，五方杂处，华洋荟萃，租界林立，新军“称雄”，进一步成为清政府镇抚中原的要地。

随着武汉政治、经济地位的上升，各种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到本世纪之初，特别是1905年以后，武汉成为社会矛盾尖锐

的地区。人民群众自发反对官府横征暴敛、抗捐抗税，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政治暴力、经济侵略的斗争，此起彼伏，层出不穷。

在动荡的社会土壤中，人民群众反清意识强化，革命组织、革命力量迅速成长，从小到大，从无到有。当时革命力量的内部积蓄，形成一股地下潜能，并进入到一个临界点，随时都可以引起地下“核爆炸”。武昌起义正是由于反动军警的倒行逆施而触发了这一场“内爆型”的革命。由于革命力量积蓄雄厚，使反动当局又不能遏制扑灭。当革命爆发时就能支撑大局。其实，爆发革命之处，在全国多有所见。不过因为内外原因，革命爆发后不能持久，倏忽之间，即被扑灭。武昌起义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首发，而且在于坚持，在于取得胜利。因此，我们与其说探索武汉为什么成为首义爆发之地，倒不如说探索武汉为什么在首义中能成为胜利之区。我们认为，这种胜利归根结底是武汉地区形成了一股由革命组织、新军士兵、人民群众觉醒所结合的历史合力，这种合力相对大于镇守武汉地区的反动势力。当然这种合力与全国各地革命力量的总体支持是分不开的。

从文化背景看，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为基础，两湖地区在祖国内地当时已成为革命思想文化传播较快较广的地区。在上世纪末，张之洞督鄂时，在武汉地区大兴洋务，其根本立脚点乃以“忠孝为本”、“中学为体”，旨在维护和加固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但他办工矿、练新军、兴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却在客观上为武汉地区先进分子接触资本主义文明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湖北地区迅速地成为一个数以万计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他们迥然不同于满口“子曰诗云”的旧式文人，他们探索新文化、新思想，不少人牢固地树立“革命排满”、“民主共和”的政治思想，成为湖北地区革命政治力量中的骨干。湖北留学生在1906年达到1300多人（占全国1/4），为全国之最。其中不少人在海外沐浴欧风美雨，亲承孙先生教诲，走上了革命道路。

两湖地区早期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如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田桐、孙武、刘成禺、李书城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和孙中山发生联系，有的人在日本或欧洲和孙中山的接触中，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洗礼，对孙先生蹶而从之。这些人士都在武汉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武昌花园山，在两湖书院，在武汉三镇秘密机关，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散发成百上千册的革命书刊，如《猛回头》、《警世钟》和《民报》等，使广阔的江汉大地上形成了一股革命的思潮。

湖北的革命组织从早期的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到辛亥革命时的文学社、共进会，都具有新的革命意识。当1905年孙中山、黄兴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湖北留学生大批入会。同盟会多次派人在湖北发展组织，并和湖北的日知会等团体建立密切地联系。

革命在武汉爆发不是偶然的。其内因深藏于武汉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土壤中。这一系列深刻的内部因素所凝集成的历史合力，形成了武昌起义这一场埋葬清王朝的“地下核弹爆炸”。同盟会的领导人曾发动过多次起义，但他们主要是从外部。如香港、越南等地临时输入革命力量到广州、镇南关等地起义。这种外铄式的革命，因缺乏“内在基础”，形成不了力量优势，均告失败。同盟会、光复会领导人也曾运动革命，在内地积蓄革命力量。但起义时，因内部因素不够深厚，莫不失败。武昌起义则是一场内爆型的革命。它是本地区厚积内部力量，在地表下形成熔岩终于涌出地表，引起火山爆发。

当然，仅仅具有客观的历史条件还不能使革命成为现实。在革命条件成熟时，革命组织、革命力量能不能发挥能动作用，点燃起革命火焰，是使革命从可能走向现实的决定因素。在这方面，两湖地区的革命党人表现出历史的主体精神。他们发挥主动性，自觉地走向了革命运动的前列。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导人

一直在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的努力具有引发武昌起义的作用。由于当时孙、黄都远悬国外，不可能具有捕捉中部革命的机遇，抓住革命的突破口。在这方面，两湖革命党人表现出历史创造者的主动性。他们并不是理论上对孙、黄有所超越，而是在激烈的社会矛盾中，具体把握革命态势，形成了革命的紧迫感，不失时机地充当了革命的驱动器。从他们在紧迫中所作出的选择，以及军力聚结、军事部署和战斗行动中，可以看到他们具有强烈的革命意识，很高的革命觉醒，也有一定的斗争水平。

湖北革命党人长期楔入新军，联合会党，在秘密状态中掌握了相当实力的武装，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创建于1896年的湖北新军，到辛亥时，总计一镇、一混成协，约一万五六千人。新军教习洋操，装配洋枪，本是巩固清政府在湖北统治的得力工具。革命党人在长期流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因此潜入新军，作艰苦的工作，发展革命力量。1904年，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成员刘静庵、吕大森、张难先、曹亚伯、胡瑛等就从军入伍，后来“秀才当兵”、“留学生从军”亦大有人在。革命党人进入新军后，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组织，在辛亥革命前，秘密参加革命组织的革命党和革命同情者占新军1/3，达五六千人之多。他们在武汉地区长期进行斗争，积蓄了经验和力量，正是他们这种自觉的革命意识和主动精神，才使革命发动成为现实。

(二)

武昌起义，是早有酝酿的。但又是缺乏周密筹划，也来不及周密筹划下发生的。从深刻的内因和长期的革命准备以及近期的酝酿而言，革命发生并非偶然。因此突发论、偶发论不能解释这一段历史。然而触发革命火焰，又离不开一系列偶然事件。

1911年10月9日上午，汉口宝善里14号革命机关，由于操作

不慎，引起炸药爆炸。这一偶然的爆炸，竟成为引发革命烈焰的火星。革命党人被逼上梁山，毅然发难。而且的确只能仓促上阵，不能按预计的时间表进行。炸弹案发生后，敌人侦骑四出。当天邓玉麟立即从汉口渡江至武昌小朝街85号机关，将宝善里14号孙武被炸情况告知蒋翊武和刘复基等人，并表示当晚非起义不可，否则，明日又不知要牺牲多少同志。蒋翊武当日才从岳州返汉，经过讨论后，他表示：“再无别法，只有提前干，或可死中求生。”于是在10月9日下午5时，以总司令名义，于小朝街85号发布了“本军今晚十时起义”的命令。不料事泄，彭楚藩、刘复基等被捕，蒋翊武逃走。起义命令未能顺利送到南湖炮队。南湖信炮未发，武昌城内外各营无法响应。10月9日晚起事的计划便未能实现。但小朝街85号机关所发出的起义命令，已把散布在武昌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紧张地动员起来，他们盘马弯弓，执戈待命。10月10日凌晨彭、刘、杨三烈士被杀害，革命党人迅速传递消息，相约发动起义。当天傍晚工八营打响第一枪后，革命党人闻风响应，一起动作，形成了浩荡的革命大军。

在起义指挥部不健全、起义领导人不在现场、起义日期又多次变更的不利情况下，革命党人却相率应命，主动响应，高度地发挥了革命首创精神，这是十分可贵的。他们中大多均为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就是他们勇敢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在首义的火光中闪现出高大的雄姿。

他们又不失时机地作出了攻打督署的正确战略决策，并全力以赴地克敌制胜。当起义大火熊熊燃起时，清朝湖广总督瑞澂和清军等八镇统制张彪此时还依仗手中掌握3000人的军队、2000人的警察，妄图固守督署，作垂死挣扎。在这个关键时刻，革命党人作出了攻坚摧敌的正确决策，决定向清廷在华中的首脑机关——督署发起总攻击。

10月10日晚上11点，进攻的战斗开始打响，民军虽因兵力不

足，无功而返，但毫不气馁，决意继续进击。晚12时后，民军又发起进攻。第三路之熊秉坤部，担任正面进攻，挺进至保安门正街，遇敌伏击，马荣、熊秉坤等组织敢死队百余人，力挫敌锋，一举攻守保安门。第一路民军攻势亦凌厉，迅克紫阳桥，越过王府口，与敌激战于长街旁（临近督署）之大都司巷。民军拼死占据大都司巷，逼敌退至督署东辕门。此时南湖炮队已进城，并在中和门、蛇山上建立阵地，发炮袭击督署。署中官役惊恐万状，多越墙而逃。残余敌军固守督署辕门。民军勇士王世龙取煤油、木柴，爬上钟鼓楼亭放火，火势大作，照亮督署前旗杆，民军炮队得以瞄准射击，轰毁督署房屋多处。民军十余人冲进辕门，被守敌排枪所阻。民军又一勇士纪鸿钧提煤油一桶，跃入督署厅旁放火。火势燎及大堂，残敌见巢陷穴崩，作鸟兽散。总督瑞澂早已派人打穿督署后面围墙，仓皇出逃，登上楚豫号兵舰。10月11日拂晓，民军通过竟夜苦战，占领了武昌全城。从工程营发难，到此时还不过12小时。

如果仅从人数对比来看，二三千人的革命军面对五千人的反动军队仍处于劣势。但革命军奋力崛起，一鼓作气，而清军则猝不及防，军心涣散。兵力、军心、民气及战略措施的正确等一系列因素，使民军终于克敌制胜。

11日，阳夏光复。革命政权在武汉三镇确立。

1911年10月11日，武昌红楼的铁栅栏前面，并排悬挂着两面武昌起义军18颗圆星的白色义旗，12名起义军官兵护卫在大旗之下，这一天是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就在这一天的下午1时许，首义的革命党人，咨议局议员及绅商代表，齐集在红楼，开会讨论组织革命军政府。会议推举军政府都督为黎元洪，民政总长为立宪派汤化龙。

军政府的建立，是胜利和光荣的行动。但是，居于这个政权中的军政首脑，却是在清政府的荫庇下曾经显赫一时的军官黎元

洪、立宪派的要人汤化龙。这就种下了革命失败的苦根。黎元洪、汤化龙在晚清湖北的政坛上，应该说是具有相当现代政治、军事、文化知识的上层人士，他们也不乏爱国心，而且也有一些好的政声。但他们毕竟是旧营垒中的头面人物，或者和旧营垒脉脉含情，而和真正的革命是从无缘的，本质上是反对的。他们置身革命政权机构，或附和革命，都是被迫的，而且迟早要发生离异和背叛的。

势如暴风骤雨的武昌首义、阳夏光复，给清王朝带来了灭顶之灾。为了挽救自己的灭亡，清王朝先后派出荫昌、袁世凯督军南下，剿灭革命。在汉口、汉阳展开了规模巨大的阳夏激战，数以万计的革命者倒在血泊中，而繁华的汉口则遭受到一场大火，使大片闹市化为瓦砾。武汉人民在革命中承受了巨大的牺牲，又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由于全国各省响应起义，宣布独立，清王朝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不久，江浙联军攻克南京，给岌岌可危的武昌带来了转机。于是才得以实现南北议和，组织新的合同性政府。

西方列强积极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联络北京各国使团，出面斡旋停战，为袁世凯绞杀革命创造了条件。11月30日，袁世凯致电冯国璋，告诉他英国出面调停，令新任汉口兵备道黄开文同汉口英国领事商办。

就在黎元洪出逃的当天，英领事派英人盘恩由军政府顾问孙发绪陪同，到武昌晤黎元洪，商谈停战。盘恩说武昌成日受炮火威胁，百姓恐慌，领事馆已同清军商谈，建议停战3日，只要同意停战条件，只要在协定上盖章，双方就可停战。停战条件规定：从12月2日上午8时起至12月5日上午8时止停战3日；在停战期内双方一律按兵不动，各守现据界限，彼此不得稍有侵犯窥探，双方行动由各国驻汉领事监视。因黎元洪出逃时将督印带走。遂由吴兆麟、孙武作主，照刻一个印，盖在协定上，算是达

成了协议。

已在逃途中的黎元洪听到了停战协定签订消息，喜出望外。次日就从王家店返武昌。刘公、张振武因黎元洪不同大家商量，弃城私逃，主张通电弹劾，但被其他人所劝阻。

停战原定3天，至12月5日，在英国领事斡旋下，继续停战3天。到9日，黎元洪和各省到汉口开会的代表，又议决各省停战15天。停战范围除陕西、山西、四川3省另议外，扩大到全国各省，由独立各省派代表与袁世凯派的代表进行谈判。若于15日内谈判不决，再延长15日。同时，黎元洪将停战条件分别电告各省都督，一律遵守。

由于汉阳失陷，黄兴又返回上海，上海成为革命党人活动中心。各省留沪代表和江、浙、沪都督急不可待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事遭湖北集团反对，不果而散。旋因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声势大振，各省革命党人一致同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从这天起，改用公历，并确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黄兴等9人为国务员。由武昌起义而触发的辛亥革命，至此夺得了创建中华民国、推翻君主专制的胜利。

(三)

武昌起义在整个辛亥革命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武昌首义摧毁了清政府在华中的统治中心。如果说，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并形成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那么武昌首义则是掀起这一高潮的最猛烈的浪峰。辛亥革命是以武昌起义为起点的，也是以武昌起义作为决

定性的战役的。这一起义来得快，来得猛，其胜利之速是历史上所罕见。起义伊始，就占领了清王朝在两湖的反动统治中心——武昌城。这样就一举给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在腹心地区打破了一个大缺口。

武昌首义给清军的重创，消灭了清王朝大股有生力量。首义的军事行动，包括起义战斗和稍后的阳夏战斗，是革命和反革命两军的大会战，是整个辛亥革命链条中关系全局的战略性决战。在首义战斗中，工八营发难之后，抢登楚望台，组成了数千人的起义大军，通过一夜的浴血奋战，光复了武昌。紧接着，在清廷十万火急地先后以荫昌、袁世凯督师会剿武汉时，民军迅速扩编，开赴汉口江岸刘家庙前线，迎战沿京汉路南下的清军，夺得了首战告捷的胜利。在清军源源增兵的不利形势下，民军奋勇抗击，在汉口三道桥、刘家庙、球场路、大智门、歆生路（江汉路）、张美之巷（民生路）、硚口、玉带门和汉阳蔡甸、三眼桥、琴断口、美娘山、仙女山、锅底山、扁担山、黑山、龟山、四平山、梅子山、兵工厂等地发生激烈的争夺战。汉口、汉阳虽在两个月的激战中失守，但战果很大，共杀伤清军在万人以上，并且最终保卫了武昌。在战斗中，武汉人民同仇敌忾，奋起支前。农民拿起扁担助战，工人和市民纷纷从军入伍，爱国的资本家如蔡辅卿（汉口商会会长）、李紫云（商会负责人）等主动捐款，还组织商团配合民军作战，以大量粮米供应军需。正是由于军民同心，协同作战，才给清军以迎头痛击。

武昌首义引起了全国响应。全国各省纷纷脱离清王朝而独立，又支援了武昌起义，巩固了首义战果。在武昌首义后12天，湖南、陕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上海、新疆都宣告独立，脱离清政府的统治。独立后的湖南等省援军开赴武汉前线，直接支持了以武汉为主要战场的革命战争。后来武汉战局恶化，江浙革命党人攻克南京，

给岌岌可危的武昌局势带来了转机。从全国革命广泛的政治联系上看，武昌起义的胜利不只是一种地域性、局部性的胜利，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努力所创造出的英雄业绩，是全国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突破，它反过来又推动了全国的革命。

武昌首义创建了湖北军政府，开共和立国之先声。湖北军政府诞生在首义的硝烟之中。它在初建时不啻为资产阶级共和政权的雏型。军政府前期的实权掌握在革命派手中。它宣布废除苛捐杂税，实行司法独立，维护和发展工商业等进步政策。所以这些都体现了革命民主精神，取得了人民拥护，也引起了各省的注视。

武昌首义也是对清廷进行总攻击的突破口，给清王朝的覆灭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创造了历史前提。武昌首义和全国响应的风暴，使清政府摇摇欲坠。当时宣统皇帝溥仪才6岁，由其父载洋以监国摄政王握政柄。1911年12月6日，载洋在革命的压力和各种政治因素作用下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辞掉监国摄政王。到1912年2月13日，清帝不得不正式退位，从此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昭告了中华民国的成立。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虽然实际上只存在了3个月，但其意义是深远的。从此以后，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想作皇帝的独夫民贼虽一再出现，但无不以惨败而告终。

(四)

但是，武昌起义创造的也不是一天云锦，它存在严重不足和缺陷所构成的斑斑阴痕，而且最终辛亥革命不能不归于失败。

无可讳言，武昌起义是存在事起仓促、布置不周的缺失的。武汉的文学社、共进会图谋在武汉发难，将革命风暴中心从祖国